

任城王漢墓出土
黃腸石題刻全集

胡广跃
编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任城王漢墓出土
黃腸石題刻全集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胡广跃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任城王汉墓出土黄肠石题刻全集 / 胡广跃编著.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7.3 (2018.4重印)
ISBN 978-7-5518-1240-5

I. ①任… II. ①胡… III. ①汉墓—石刻—研究—济
宁—东汉时代 IV. ①K877.4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4292 号

任城王汉墓出土黄肠石题刻全集

胡广跃 编著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8
印 张	104.5
字 数	60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240-5
定 价	680.00 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n>

前 言

济宁历史悠久、文化繁荣，为中华文化的缩影。同时，又因其东依泰沂山脉，西接中原平地，古泗河流贯穿全境，所以又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一区域是上古东夷族聚居的地区，曾是我国传统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7000年前至5000年前是伏羲氏、女娲氏、炎帝、黄帝、少昊帝一脉相承的东夷文化。龙凤图腾的肇始是其灿烂的文化标志。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邾娄文化和鲁国文化很兴盛，并由此造就了主导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孔子、孟子及其儒家学说。两汉时期是济宁历史上的又一个文化发达时期，它不仅继承了先秦邹鲁文化的传统，而且将其发扬光大，在“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环境下，使本区域思想文化等方面得以较快发展，并达到了空前繁荣，对中国历史产生了积极影响。

悠久和辉煌的历史使济宁拥有丰厚的文化积淀，两汉碑刻是丰厚文化积淀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无论在数量、质量和种类上都位居全国领先地位。一个地区发现和保存这么多碑刻，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堪称中国之最，因而素有“中国汉碑半济宁”之誉。

在两汉碑刻中，最具特色的是位于济宁城北的汉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保存有黄肠石题刻785石，为全国已知汉墓之最。然而，这些比较罕见、相对较少的石刻资料还没有系统收集和整理，几乎成为汉代考古和石刻研究的空白点。而且由于墓葬资料较少的缘故，近些年来国内对黄肠石墓的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甚至对黄肠石的种类和用途有明显的错误论述，如西汉大型崖墓的塞石，也有学者认为是黄肠石。对于黄肠石题刻的研究，是值得学术界关注和填补研究的空白点。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的出土，为这些研究提供了翔实和丰富的原始资料。

“黄肠石”一词最早出现于《水经·济水》注：“灵帝建宁四年，于敖城西北垒石为门，以遏渠口（浚义渠），谓之石门……石铭云：‘建宁四年十一月，黄场（肠）石也，而主吏姓名磨灭不可复识。’”王国维在《南越黄肠木刻字跋》中认为，酈道元《水经注》中的“垒石为门”始于汉灵帝建宁四年是错误的，实际上这些黄肠石为汉建宁时期旧墓石。原来黄肠本用木，后以石代替。研究汉代黄肠石成就最高的是清末民初罗振玉，他在《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石交录予考知黄肠石》等著作中有详尽的阐述。罗振玉根据《周礼·夏官·方相氏》郑注及《水经·济水》篇注，把《匋斋藏石记》中的永建五年墓石题字、泠攸石题字、禹伯石题字、建宁残石等四石，定名为黄肠石。此说得到以后研究者的认可和赞扬。洛阳赵振华先生著《洛阳东汉黄肠石题名研究》，对当今发现收藏的黄肠石的著录和研究历史做了详细清晰的梳理和介绍。济宁文物局主编《汉任城王墓刻石精选》和笔者编著《山东书法全

集——汉任城王墓题刻文字》，主要对汉任城王墓出土黄肠石的一部分进行了著录。山东石刻艺术馆研究员赖非、济宁市的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黄肠石题刻进行了专题研究。

东汉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文字，一般3~5字，最少1字，最多11字，内容相对简单，主要是制作石料的有关工匠和管理官员的姓名、籍贯以及石块的尺寸、编号等。然而在这简单的铭文中却包含了重要的古代法律制度和陵墓制度等研究资料。全面考察和探索黄肠石本身所包含的诸多相关内容，必须全面掌握或占有反映其原貌的原始信息，如黄肠石文字在墓中所处位置、题刻文字本身之间的相对关系等。这就要求或促使我们必须把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多方位、多视角、全面地加以整理和著录，并加以分析研究。因此，“全集”任务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本书主要有前言、概论和图录三部分。前言和概论部分，主要对这些黄肠石题刻中涉及的古代考工制度、陵寝建造制度、石工性质、石料来源和使用情况等问题做了研究和探讨，并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图录安排上，主要按照文物考古发掘出土顺序，即先录封顶石，再录封门石，最后是“题凑石墙”石。每一石都进行了拓本和原石的照相对比，并做了释文，同时考虑字与字、石与字之间的对应关系，力求反映其原始信息和全貌。

但愿此书的出版，能给学界提供翔实可靠的研究资料，使读者获得系统的专项知识和有益的启迪。

由于作者学识有限，错误在所难免，请方家批评指正。

2016年11月5日于山东济宁古任城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1
概 论	1
黄肠石题刻拓本	1
一、封顶黄肠石题刻拓本	3
序厅东壁	4
序厅西壁	38
序厅北壁	82
二、封门、棺床黄肠石题刻拓本	151
三、前室南壁东、西部分黄肠石拓本	167
前室南壁东部分	168
前室南壁西部分	218
四、前室北壁东、西部分黄肠石拓本	271
前室北壁东部分	272
前室北壁西部分	300
五、前室东壁黄肠石拓本	329
六、前室西壁黄肠石拓本	415
七、后室西壁黄肠石拓本	515
八、后室东壁黄肠石拓本	605
九、后室北壁黄肠石拓本	697
后 记	811

概 论

一、任城王墓群（萧王庄墓群）与（任城王墓）M1 简况



图一 任城王墓位置图

任城王墓，位于济宁市任城区李营街道办事处肖王庄村南（图一）。此墓地南北长 790 米，东西宽 800 米。原有墓葬九座，当地人称曰“九女（米）垸堆”^[1]，早年此地松柏成林，积土如丘。明代靳学颜^[2]作《九冢诗》曰：“虹梁袅袅带荒陂，青冢垒垒似九疑；石马有魂嘶夜雨，金凫无羽泛洪池。当年应下牛山泪，落日空留挂剑枝；试一投祠向漠漠，白杨无数起悲思。”这是对墓群最早的文字记录。《济宁市志》卷一《疆域略》载：“九女堆，在县北五里，凡九堆，七在西，二在东，参差相向，或以为檀道济筹量沙所筑……”由于人为破坏和水土流失，“九女垸堆”现仅存带有封土的墓葬四座，其他五座皆夷为平地。九座墓葬编号为 M1 ~ M9。M1 坐落于济宁市传染病医院北侧，封土底径 50 米，高 10 米；M2 在肖王庄村东南约 600 米处，20 世纪 60 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当地村民掘开，墓室惨遭破坏，现仅存封土，出土的一大批铜器、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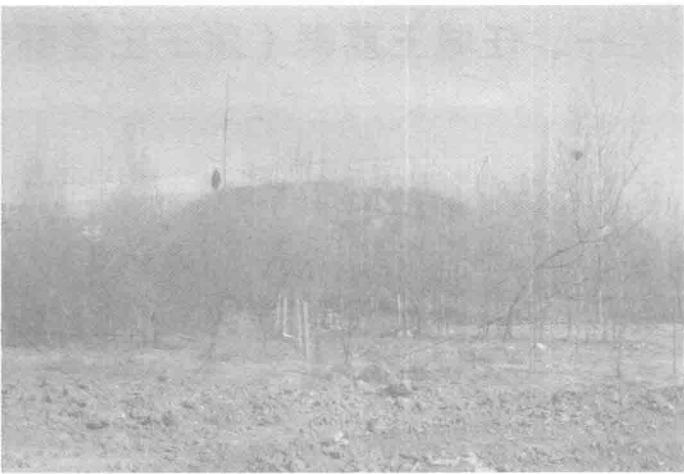


图二 汉白玉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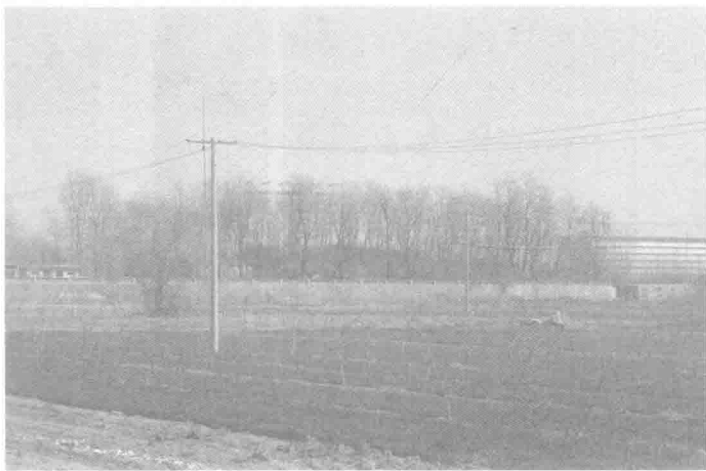
玉衣片等文物，亦损失破坏殆尽；M3 位于村庄东南隅现某空军雷达部队驻地院内，封土高约 6 米、底径 40 米，1970 年驻军在其上安装机器设施时，部分墓室被破坏，曾出土青铜器和玉石器若干，现济宁市汉任城王墓管理所和济宁市博物馆收藏的汉白玉石俑共四个（图二）即为 3 号墓之物；M4 位于村南约 400 米处，封土高 6 米，底径 40 米；M5 位于济宁市传染病医院东南角处；M6 位于济宁市传染病医院“太平房”附近；M7、M8、M9 号封土已无，



萧王庄墓群一号墓封土外景



萧王庄墓群二号墓封土外景



萧王庄墓群三号墓封土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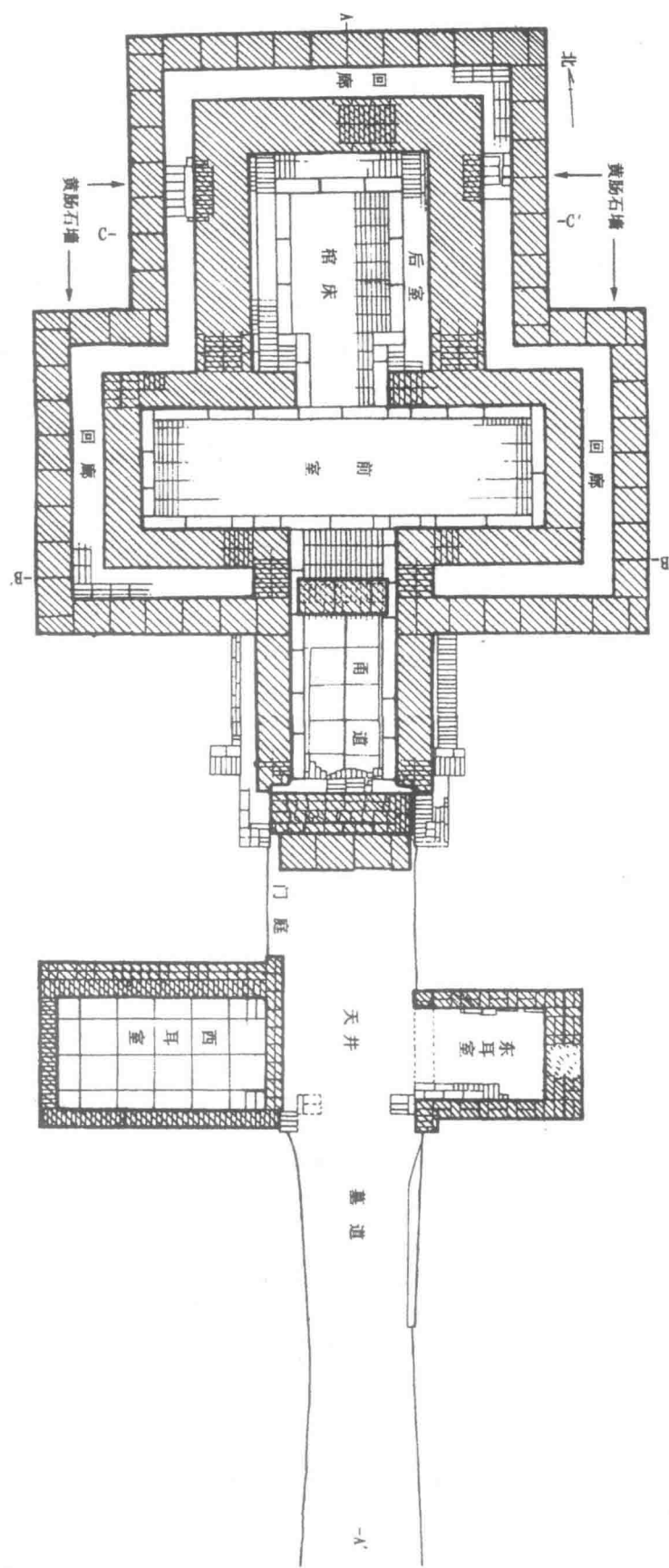
萧王庄墓群四号墓封土外景

图三 萧王庄墓群封土外景

位于 M3 西北和东北侧（图三）。墓群规模宏大，远望似山丘。据史载，汉魏时，济宁曾置“任城国”，从墓葬结构和出土文物，尤其是一号墓的发掘情况来看，M1 ~ M9 当为东汉任城国诸王陵墓，有着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1977 年，墓群被公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号墓位于墓群西北部，即今济宁市传染病医院西院内。现存封土直径 60 米、高 12 米，是墓群中诸墓封土最大的一座，当地群众称其为“大垱堆”。1992 ~ 1995 年，经上级部门批准，济宁市文物局对其进行了发掘。

墓葬坐北向南，由封土、墓道、耳室、墓门、甬道、前室、后室、回廊、题凑石墙等部分组成（图四）。封土系由黄褐色土夯筑而成，土质较为坚硬，夯层厚 15 厘米 ~ 50 厘米，夯窝圆形平顶，直径约 6 厘米 ~ 10 厘米。封土较纯净，仅包含少量战国、西汉陶片和砖块等。封土东南部有一盗洞，径 30 厘米，填土内含少量玉衣片、漆器片、铜器小件和五铢钱等。墓道位于墓室南部，斜坡状，南北残长 22.8 米，上口宽 4.1 米 ~ 5.2 米，底宽 2.7 米 ~ 3.8 米。



图四 一号墓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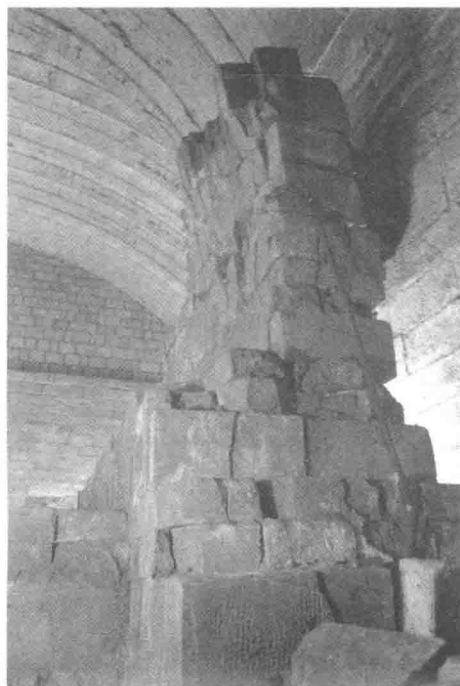
因结构不同可分南北两段，南段即墓道口至天井通门部分，为纯土道；北段即天井通至墓门部分，包括天井、东西耳室、门庭。整个墓道壁经过修整，壁面有木板拍击和工具铲削痕迹，局部墓道壁经过加固，耳室南北两侧夯土壁有木棍、木板朽迹，木棍竖置，长 30 厘米 ~ 50 厘米，径约 4 厘米；木板多横置，长 1.2 米 ~ 2.1 米，宽约 15 厘米。生土壁面下部涂抹一层牲血、白灰拌和物。墓道底均经夯打，底面除门庭外亦铺一层同种物质，甚为坚硬。墓道

南段北部东侧底留长方形生土台，长 4.3 米，宽 10 厘米 ~ 35 厘米，高 125 厘米 ~ 40 厘米，似为置物而设。依墓道坡度推算，原墓道全长约 30 米。现墓道残长 22.8 米，宽 2.7 米 ~ 3.8 米，其中部东西两侧设对称耳室，耳室位于墓道北段天井两侧，东西相对，平面呈长方形，周砌砖壁，前有券门，券顶一层，已塌。西耳室东西长 5.35 米，南北宽 2.9 米，壁高 1.65 米，厚 0.5 米。石块铺地面，砖壁砌于石块之上，以致周缘挤压下沉。门外有封门墙一堵，两横二竖砌垒。墙高 3.5 米，宽 4.05 米，厚 0.5 米。耳室南壁被现代防空洞打破，文物几乎盗劫一空，仅剩陶耳杯和铜车辖、车轮等小件遗物。东耳室东西长 3.35 米，南北宽 2.4 米，壁高 1.65 米，南北壁厚 0.5 米，东壁厚 1 米。室底夯实后铺一层土、牲血拌和物，较为平滑。门外亦有封门墙一堵，已破坏殆尽，结构不详。耳室东、南壁被现代防空洞打破，仅出土铜猪和陶圈厕、盘、碗等少量遗物。天井位于墓道北段，北接门庭，南接通门。南北长 6.5 米，东西宽 3.8 米。通门在南段墓道北端，口宽 2 米，高 1.5 米。天井空间为墓道最宽处，似象征墓室前院落。门庭位于墓门外，南连天井。东西长 3.7 米，南北宽 1.6 米。两壁砌砖，地面铺砖一层，砖壁宽 0.8 米，高 3.7 米。两壁后端各有一深入封土，东西相对的柱洞，径约 40 厘米，洞内有朽枋木。据此分析，此处可能原有木顶，即墓门檐。封门墙在门庭内，两堵墙均遭破坏。前为石墙，后为砖墙，紧密相接。石墙系用长方形石块垒砌，宽 3.4 米，高 3.65 米，厚 0.95 米。砖墙系一横一竖砌，宽、高与石墙相同，厚 1 米。两墙西侧上部均被盗掘者拆除。墓门位于墓道北端甬道口，门口宽 3.2 米，高 3.45 米。门后甬道两壁抹棱角，门下两端各设一砖台，其外发现一道东西相连的枋木痕和燃后的灰烬。墓门原来可能有木质的门扇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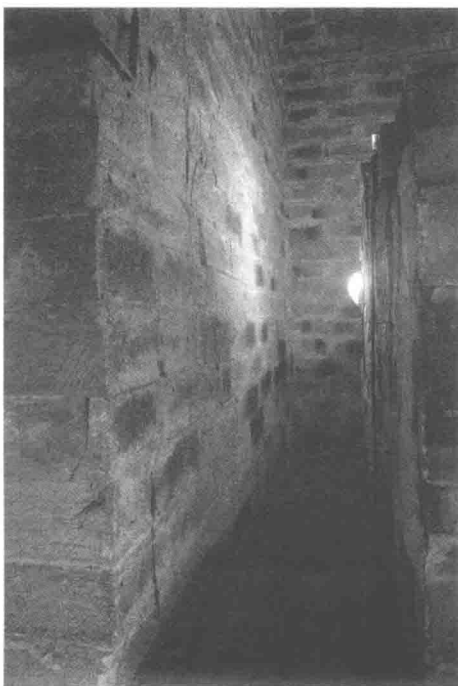
甬道位于墓门后，北端与前室相通。长方形，南北长 6.7 米，东西宽 2.8 米，壁高 3.45 米，厚 1 米。顶部残塌，券砖二层。地面铺砖四层，大部分被盗掘者揭除，露出底石。在甬道壁近夹石墙处，又有石墙一堵，高 3.65 米，宽 2.35 米，厚 0.95 米。中上部石块大都被盗掘者翻至甬道底面，此墙东西两端与甬道壁间留出 10 厘米的空隙，似为排水而设。甬道券顶东西两侧各砌砖缘，南端设砖阙一对，阙略呈方形，边长 75 厘米，高 70 厘米。

前室位于甬道北侧，后室南侧。横长方形，东西长 10.05 米，南北宽 3.3 米，壁高 3.45 米，厚 1 米。中间前后有门通甬道、后室。北壁上两端各有砖台，内连券顶脚应为东、西壁原高度。室顶全塌，从后壁两端尚存的券脚看，前室侧顶南北起券，券砖二层。经观察分析，门道间室顶可能在周围券顶（前室侧顶，后室、甬道顶）边沿上垒砌，呈叠涩状收分，形成藻井。地面铺砖中下层间遍铺约 40 厘米厚的木炭，用来防潮，因木炭朽碎，地面下凹 10 厘米 ~ 30 厘米。室内严重盗扰，扰土中发现少量玉衣片、小件玉器、小件鎏金铜器，以及大量陶石器残片，东侧地面有大面积铜锈迹，原应放置大量铜器。

后室位于前室之北。竖长方形，南北长 5.75 米，东西宽 4.7 米，壁高 3.7 米，厚 1.45 米。东壁中部、后壁中上部均被盗掘者拆除。室顶坍塌，仅后部东西壁尚存上层券顶脚，可见室顶东西起券，券砖三层（图五）。后室中部设棺床，床面与前室平行。棺床周边用长方形石块铺砌，东西宽 3.3 米，南北长 4.38 米。石块长 95 厘米，宽 45 厘米，厚 25 厘米。石块周边内铺地结构与前室相同。棺床高于后室地面 25 厘米，在棺床和后室地面上，有厚约 20 厘米的未燃尽的木炭和灰烬，应为棺槨焚烧后的残迹，尸骨朽碎过甚，扰土中可见零星碎骨。



图五 后室西壁券角



图六 1. 南壁西段回廊



图六 2. 南壁东段回廊

室内仅发现玉环、玉衣片、陶器片、五铢钱等少量遗物。回廊四面围绕前后室，平面呈“凸”字形，周长 51.25 米，高 3.8 米，宽 0.8 米（图六）。廊门被甬道壁堵住。平顶已塌，仅东西廊檐部尚存与后室券脚相连的部分。廊顶长方形砖、楔形砖混用，平置于砖石壁间，上下残存 7 层。廊底靠石壁处砌砖带一周，并列三排，其与砖壁形成约 40 厘米的空间，下部填充木炭、草木灰，上部填充白灰土混合物，表面夯实。黄肠石墙位于回廊外侧，即墓室之内壁。大都用正方形石灰岩块垒成，长方形石块仅用于拐角处，内面通长与回廊相同，高 7 米。正方石边长 95 厘米，厚 25 厘米左右，打制基本平整。石墙单道垒砌，墙顶三排呈叠涩状。封顶石坍塌，仅北部尚存后室券脚、廊顶支撑的部分石块，叠涩四排。据此分析，原封顶石三层，周围石块先由石墙向内呈台阶状平砌，叠涩六排约至墓室顶券腰处，券顶之上再平盖石块，最后形成覆斗状石顶。而其下空间则用土杂物填实，以作为承托。墓室顶石边缘紧扣石墙，把整个砖室墓包围在一个偌大的石宫里。建筑十分考究，结构颇具特色。一号墓所用石材包括题凑石墙、封顶石、封门墙、各室底边石、棺床边石约 4500 余块，其中暴露在外，可以看到的文字刻石计 785 块，约有 4000 余个单字。据墓葬发掘者估计，埋压在封土和石墙内的题字石刻是目前可见题字的一倍左右。

二、任城王墓（M1）墓主人的推测

（一）关于墓葬的年代

M1 规模巨大，建筑工程相当浩繁，属大型汉墓。这种外用石材做框壁，内以砖砌墓室的墓葬，在目前发现的汉代墓葬中较为少见。从其前后室呈横纵长方形排列的形制看，具有明显的东汉墓葬特点。而墓葬形制结构与东汉中期的河北定县北庄汉墓^[3]最为相似，外壁皆用黄肠石砌垒，墓室分为前室、后室和回廊，各部砌法几乎完全相同。但相似中也存有一定差别。北庄汉墓后室外另设三面回廊，回廊外砖、石壁间通道，不设顶盖，而 M1 后室外不设回廊，但前后室外的砖石壁间通道有平顶，应象征回廊；北庄汉墓墓道内设一耳室，而

M1 墓设对称耳室。整体而言，二者大同小异，墓葬年代应相距不远。

从出土陶器来看，肖王庄一号汉墓器物组合以及器形特征，均与北庄汉墓所出基本相同。如 M1 墓的壶、I 式碗、樽、罐、盘分别与北庄汉墓 I 式壶、樽（208 号）、碗（194 号），II 式罐、盘（180 号）相同或相似，并具洛阳烧沟汉墓^[4]五期陶器的特征。此外，M1 墓所出 II 式五铢钱、北庄汉墓所出五铢钱（253 号）皆与烧沟汉墓的 III 型五铢相似。两墓遗物诸多相似，墓葬年代亦应相近。

从题刻来讲，M1 墓铭刻内容及诸多地名均与北庄汉墓的相同，书法风格也较为相似。更为重要的是，二者皆有“鲁柏仲”铭刻。“鲁柏仲”，即本墓“鲁石工柏元仲华”铭刻的省写。地名人如此巧合，更加说明，M1 墓与北庄汉墓相对年代非常接近。

M1 墓铭刻地名，见于《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当是东汉建造墓葬时的地名，为墓葬年代的推定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依据。如“梁国己氏魏贤”铭刻，据《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己氏县，西汉属梁国，东汉属济阴郡。然《后汉书·孝明八王传》载，梁节王畅“（建初）四年（79）徙为梁王，以陈留之鄆、宁陵，济阴之薄、单父、己氏、成武，凡六县益梁国。……永元五年（93）……削成武、单父二县。”显见东汉初故梁己氏先属济阴，再属梁，永元五年仍属之。又据史书载，削二县后，畅曾上疏“乞裁食睢阳、穀孰、虞、蒙、宁陵五县，还余所食四县……不许。立二十七年薨。”可知梁国此时共有九县，这恰与《后汉书·郡国志》梁国所载“九城”相吻合，并且“裁食”五县名均在其中。由此分析，传所载九县，即为志中的九城，二者相对照，传中“还余”四县应是砀山、下邑、鄆、薄。而己氏县不在的情况应说明，最迟在永元五年后的畅上疏之年，己氏县已不属梁国。也许因己氏短时属梁，所以《后汉书》把它划入济阴郡中。该墓铭刻“梁国己氏”，可证墓葬年代的上限不会早于建初四年（79），下限应在永元五年（93）至十年（98 年畅薨）之间的己氏县改属前后，即章帝、和帝时期。而这个年代正是《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中记载的任城国始封王孝王刘尚的在位时间（84 ~ 101 年），由此增强了上述推测的可信性。

（二）关于墓主人的身份

M1 地上封土如丘，墓室巨大，墓主人绝非是一般的贵族和官吏。从墓石铭刻地名看，不仅有当地任城国和山阳郡的部分县名，而且还有周围的鲁国、东平国、梁国、沛国，乃至较远的上党郡、常山国的大部分县名，这么多远方工匠，来为死者建墓，工程浩大可想而知，在汉代只有王侯和皇亲勋贵才具如此的特权和殊荣。墓室出土的银缕玉衣片，亦为墓主人高贵的身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据《后汉书·礼仪志》载：皇帝崩后“黄绵缙繒金缕玉柙如故事，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另据考古资料，这种玉衣制度在西汉尚未确立，到了东汉成为定制。东汉帝陵尚未发掘，至今发现的十余套东汉时期的玉衣，皆为银缕、鎏金铜缕和铜缕，墓主人享用银缕或鎏金铜缕的是诸侯王和始封列侯，享用铜缕的是诸侯王、列侯之配偶或嗣列侯。该墓出土银缕玉衣片，可证墓主身份应为诸侯王或始封列侯。

据文献记载，墓葬所在地济宁，周为任国，西汉至东汉初为任城县地，属东平国。东汉章帝元和元年（84）分东平国为任城国，割任城、亢父、樊三县属焉。我们认为，任城国王

城不在任城县城，而在今济宁市，任城县城则在王城东南 40 里的仲家浅。唐代李白《任城县厅壁记》曰：“炎汉之后，更为郡县，隋开皇三年（583）废高平郡，移任城于旧邑。”系指始移任城县于汉任城国之旧址，即今济宁市区。经文物调查，市区北部汉石桥和铁塔寺东西线上，曾发现汉代夯土城墙遗迹，即汉任城国北城墙。济宁市区南部越河崖曾发掘可能是汉任城王妃的墓葬^[5]。城北约 3 千米的肖王庄周围，至明代还分布着大小土冢九座，曾被破坏的四号墓，出土大量铜器、汉白玉俑和玉衣片。M1 为任城王汉墓群中的一座，规模巨大，地望上又处在汉任城国北部，当为任城国王的墓葬。

据《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记载，任城国自章帝分封，迄汉末禅位，历 136 年，共有五王（表 1）。该墓主究竟是哪一个王呢？我们将推测年代与诸王相对照，不难找出答案。

表 1 东汉任城国王在位年表

名 称	在位时间	在位年数	备注
孝王刘尚	章帝元和元年 至 和帝永元十三年（84 ~ 101）	18 年	东平宪王刘苍次子
贞王刘安	和帝永元十三年 至 安帝元初六年（101 ~ 119）	19 年	刘尚子
节王刘崇	安帝元初六年 至 桓帝建和三年（119 ~ 149）	31 年	刘安子
刘博	桓帝延熹四年 至 灵帝熹平二年（161 ~ 173）	13 年	河间孝王子
刘佗	灵帝熹平四年 至 献帝延康元年（175 ~ 220）	46 年	河间贞王子

由表 1 看出，东汉任城国五王中，只有任城孝王刘尚在 M1 墓下限年代（93 ~ 98 年）范围内。

M1 位于整个墓群的西北部，封土最大，故民间久传为“大堎堆”，当为墓群之主墓。墓后 10 余米的肖王庄村，“肖”字或写“萧”，可能系口语相传，由“孝”字讹变而来。因此，我们认为，M1 墓主人可能是东汉任城国孝王刘尚。其未死之先即营造墓葬。

三、任城国概况

任城历史文化悠久，素有“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美称，是东方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夏朝时期，太昊（伏羲氏）后裔有仍氏（亦称有任氏，任、仍古时同音）就在这里建立了仍国。周朝时期，仍国被封为任国。春秋战国时代任国先后隶属于鲁、宋、齐国。秦统一中国后，废任国而改为任城县。这是“任城”称号的最早由来。东汉时设任城国，国治任城（今济宁市区驻地）。南北朝北魏神龟元年（518），在此设立了任城郡。五代后周广顺二年（952），设济州于巨野，任城县隶属济州。金天德二年（1150），巨野发生大洪水，遂把济州州治迁至任城。元至元八年（1271），升济州为府，因“济水南汇泗，北汇汶，州居其中”，地势高而水患不至，取吉祥安宁之义，更府名为“济宁”。任城县也由此改称济宁市。8 年后升府为路，任城属之。明洪武十八年（1385）仍降为济宁州。清朝为济宁州、济宁直隶州，隶属兖州府。

东汉任城国，秦时为任城县，属薛郡，西汉仍设任城县，属东平国。东汉时实行州、郡（国）、县三级行政机构。郡国并行，凡分封诸侯王的区域设国，直属朝廷管辖。任城县改设为任城国，仍属东平国。东平国宪王刘苍是东汉初期卓越的政治家，任城王墓主人刘尚为

其次子。《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曰：“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东海恭王彊、沛献王辅、济南安王康、阜陵质王延、中山简王焉，许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显宗、东平宪王苍、广陵思王荆、临淮怀公衡、琅邪孝王京。”十一子中，初立刘强为太子，后徙封东海王，国于鲁；刘庄嗣皇帝位，为孝明皇帝，刘苍和余诸子封王。关于宪王刘苍，《后汉书》中对其记载颇详，为“光武皇帝第八子，阴皇后所生，明帝之弟”；他“少好经书，雅有智思，为人美须髯，要带十围，显宗甚爱重之。及即位，拜为骠骑将军，置长史掾史员四十人，位在三公上”“建武十五年封东平公，十七年进爵为王”。永平元年（58），封苍之子二人为县侯。二年（59）将东郡之寿张、须昌，山阳之南平阳、橐、湖陵五县加进东平国。这时中兴三十多年，四方没有忧患，刘苍认为天下化平，应修礼乐，便与公卿共同议定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及光武庙登歌八佾舞数。皇帝每次巡狩，刘苍常留下镇守，侍卫皇太后。他被分封东平国后，治理东平兢兢业业，政绩突出，东平一带五谷丰登，人民安居乐业，深得三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器重，常受皇赐，并被当时人称为“汉代周公”。刘苍于建初八年正月卒，葬于王陵山。

东汉元和元年（84），章帝分东平国置任城国。封光武帝刘秀之孙、东平宪王刘苍次子刘尚为任城王，国治任城（今济宁市），辖任城（今任城区）、亢父（今济宁南）、樊（今济宁北）三县。人口约19万，城户3万多户。任城王刘尚传了两代，子贞王刘安，孙节王刘崇，崇无子国绝，共77年。汉桓帝延熹四年（161），立河间孝王之子刘博为任城王，任13年薨，无子国绝。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复立河间孝王之子刘佗为任城王，任46年。三国时期，魏黄初元年（220）曹丕称帝，废除任城国，改称任城县。任城王的世系是：孝王刘尚、贞王刘安、节王刘崇、刘博、刘佗。萧王庄墓群极有可能是任城孝王刘尚等五王及其后妃的陵区。

任城孝王刘尚是东平宪王的次子、东平怀王刘忠之弟。按汉律，东汉藩王诸子按例封列侯，刘尚以藩王次子进封王爵，这在东汉不多见。另外，还先后封刘苍五女五男为公主、列侯。和帝时，封刘苍孙六人为列侯，一人为亭侯。安帝永宁元年（120），又封苍孙二人为亭侯^[6]。这一方面体现了章帝意图分化东平国势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朝廷对东平宪王刘苍所做贡献的认可。其儿孙封在任城，死后享受较高规格的葬制。

四、任城王墓（M1）的建造

（一）设计

任城王墓从基址选择、空间布局、墓葬建筑都经过精心规划和设计，主要有以下特点：

任城王墓坐北朝南，墓地位于济宁市北部，地势为北高南低。原墓葬封土高大，是整个济宁市的最高点。据文献记载，至少在明代时墓群还保存完好，封土如山丘，其上松柏成林。

任城王墓为东汉初年大型砖石结构墓，券顶结构，分为前后两室，回廊围绕前后室，回廊外墙包括券顶之上，用石块垒砌。耳室设在墓道两侧，前后室之间筑有隔墙，中部留有通道。整个墓室模仿汉代住宅“前厅后室”的建筑式样，前室为设祭之所，是墓主人生前宴享的前堂，后室则象征墓主寝居。

整个墓葬的平面形状比较独特，墓道的两侧设耳室，建筑布局则大都采用均衡对称的方

式，多以中轴线为主，横轴线为辅。整个建筑体现出对称的均衡美。对称均衡原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最完美体现。厚实的石墙和砖墙闭合了整个空间，左右耳室标定了视觉的均衡中心，这一切为在无限的空间中闭合可感知的有限空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四灵地”^[7]格局中“左青龙、右白虎”的建筑美学指向，由此衍生出“驻远势以环形，聚巧形以展势”^[8]的中国传统建筑空间艺术处理原则，使中国建筑的空间布局和各种建筑本身处处体现出一种对称美。均衡对称的堪舆思想对中国建筑空间布局影响极深，从而形成了中央向四周扩展的建筑布局方式。这也是该墓设计和选址的主要依据。

任城王墓前室、后室以及耳室都使用了拱券顶，形成了较为规整的多室拱券顶、中轴线左右对称墓葬。它一方面仿制了现实中的房屋，汉代中国建筑的“反宇向阳”^[9]屋顶坡面形式业已成熟，墓葬拱券顶的弧线与现实建筑屋顶坡面弧线保持一致，与天圆弧度保持对应与连接；另一方面拱券顶结构符合建筑力学结构原理，满足了墓葬建筑功能要求。

石材与砖材构件是任城王墓的主要建筑材料。该墓前室、后室基础以及墓圻、顶部部分用石材堆筑，前室、后室、耳室、券顶用方砖砌筑。石材构件大部分题刻文字，极少数刻有画像，规格有长方形和正方形两种，厚度一般是一尺（汉代一尺约 23.5 厘米）和九寸。石材大小与厚薄以使用部位不同而各异，以正方形厚一尺石材为主，石墙拐角以及封门墙、封顶石处用长方形石。所有石材构件凿刻规整精细，尺寸大小整齐划一，石材之间的都能严密合缝，并且用白灰浆黏结。

（二）建墓石材及其来源

任城王墓墓室用砖砌筑，四周加围石块作墙，顶盖石块，学界称为石材题凑墓，石材称为黄肠石^[10]。这些石材来自距离王墓 10 千米的嘉祥县附近，现今当地仍然盛产优质石材。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发掘了一批两汉时期的诸侯王墓，墓葬形制多样，建筑用材不同。其中有用黄肠石为椁的，或者建有“题凑石墙”^[11]，有用塞石封堵墓门甬道的，或有题铭。除任城王墓外，还有山东巨野红土山西汉昌邑王哀王刘髆墓出土黄肠石题刻 31 石，其中 17 石阴刻题记，14 石朱书题记^[12]；陕西咸阳西汉帝陵陵区发掘的西汉济南王刘咸墓，发现黄肠石题刻 170 石^[13]；永城僖山一号墓为西汉末年梁国王陵，墓道后段用 408 块黄肠石封堵，大部分石上刻有文字^[14]；1959 年发掘了位于河北省定县北庄东汉前期的中山简王刘焉墓，发现 174 块黄肠石有题刻及少量墨书文字^[15]；1970 年南京博物院发掘了土山汉墓（彭城王墓）一号墓，出土黄肠石 58 块，其中可见（个别刻面因砌于墙内不好统计不计）有题刻者 26 块约 40 条^[16]。这些黄肠石题刻的出土为研究两汉时期的墓葬制度、行政地理、社会状况等提供了重要原始资料。

黄肠石很早就有出土与利用的情况。《水经·济水》注中有汉灵帝建宁四年用黄肠石修建的石门的记载^[17]。研究和收集汉代黄肠石相关资料始于清末民初。罗振玉在他的《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石交录·予考知黄肠石》等著作中，对黄肠石及其题铭作了初步的探索。20 世纪 80 年代，洛阳的考古工作者根据两块新出黄肠石题刻，为一座帝陵定名^[17]。当今赵超、赖非、赵振华^[18]等学者在石刻专著中作过简要论述。20 世纪 90 年代发掘的任城王墓出土黄肠石约 4500 石，其中有铭刻者近 800 石，在全国实属罕见。

铭刻地名与《后汉书·郡国志》相对照，其中包括任城国及相邻的封国、郡、县名 27 处，计有任城国的任城县，东平国及所属富成、无盐、须昌、东平陆、章县，鲁国及所属鲁、邹、蕃、薛、文阳县，梁国（郡）及所属睢阳、宁陵、下邑、薄、己氏县、鄆县、穀孰县，山阳郡及所属金乡县、高平侯国，沛国的滕（公丘）县，较远的县侯国 2 处，有常山国的都乡侯国，上党郡的高都县。这 27 处地名，对考证东汉地方行政制度区划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也成为推断墓葬年代的佐证之一。

（三）任城国与石工国县的关系

汉代的石刻艺人已经引起了学人的关注^[19]。邢义田在《汉碑、汉画和石工的关系》一文中首先讨论了石工的地位。汉代的石刻艺人在画像石题记和碑刻中有“良匠”“石工”“工”“石师”“师”“画师”“刻者”等不同称呼^[20]。从“无盐石工浩大”和“金乡匠斋”等刻石内容看本墓石刻艺人称为“石工”。任城王墓涉及任城国、东平国、鲁国等 27 处地名和人名中，石工共 57 位，能明确籍贯身份的有 40 位。要弄清楚当时任城国与石工国县的关系，必须了解建墓石工或组织者们费时费力地把文字刻在这些石上面的动机。《礼记·月令》载：“是月也，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案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21]从文献中我们可以推测，任城王墓刻石除了便于工程施工原因外，应是建墓组织者为“工师（石工）”的“物勒功名”，其目的是“考其诚”，在筹建工程或者工程验收中如有“不当”之处，处罚方法是“行其罪，以穷其情”。

《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载：刘焉墓（北庄汉墓）在建造过程中“发常山、钜鹿、涿郡柏黄肠杂木，三郡不能备，复调徐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数千人……”显然，当时建墓所需黄肠杂木三郡不备的情况下，遂用砖石材代替，故征发各地工匠送石者数千人。从任城王墓众多的人名、地名和墓葬建筑规模的情况来看，当时建墓时，任城国征发东平国、鲁国、梁国等地工匠来为墓主人建墓，其规模和数量应不少于北庄汉墓。

题记刻石中官职（如邹祭尊石治张）和匠斋（如金乡匠斋）的出现，证明这些石材可能部分出自官营手工匠之手，另一部分出自民间石工作坊的石工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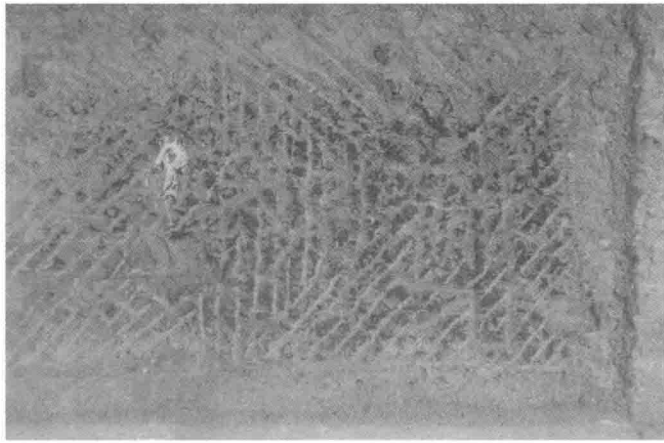
五、黄肠石题刻的分类、书风和价值意义

（一）内容分类和书风

任城王墓的建筑石材，每石大小一致，打制规整，整齐划一，石的四面都用鑿道做出几何图案，从每石的大小形状上分，主要有三种规格：一是厚度约 23 厘米～25 厘米，每边约 95 厘米的方石；二是厚度 1 尺约 23 厘米～25 厘米，长 95 厘米，宽 50 厘米～60 厘米的长方形石；三是厚约 21 厘米的上述所言的方石和长方形石。每石的装饰图案不一，主要有 6 种（如图七）。文字大部分刻在方石和长方形石的侧面，少数刻在方石或长方形石正面（叠压面）（如图八）。每石文字最少一字，多数 3～5 字，最多 11 字。在内容主要是工匠和送石者籍贯姓名，数字尺寸，另有官职、作坊、吉语等内容，计有 785 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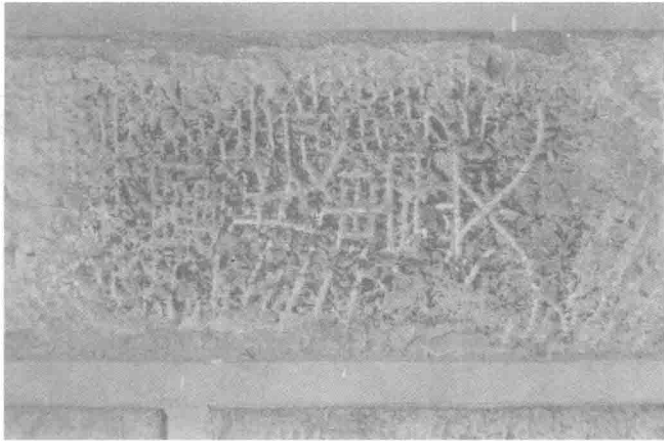
图七 1. 底纹图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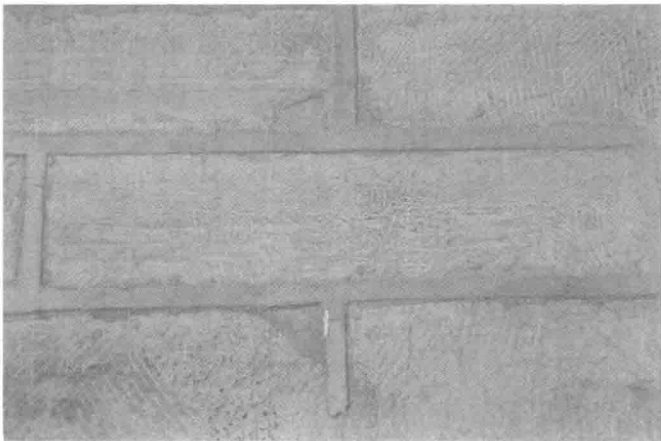
图七 2. 底纹图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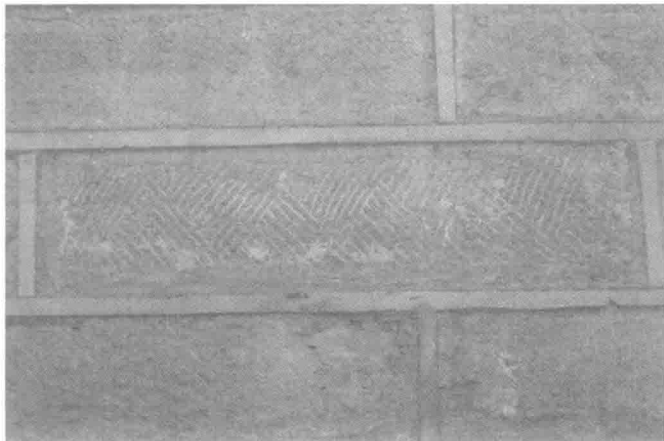
图七 3. 底纹图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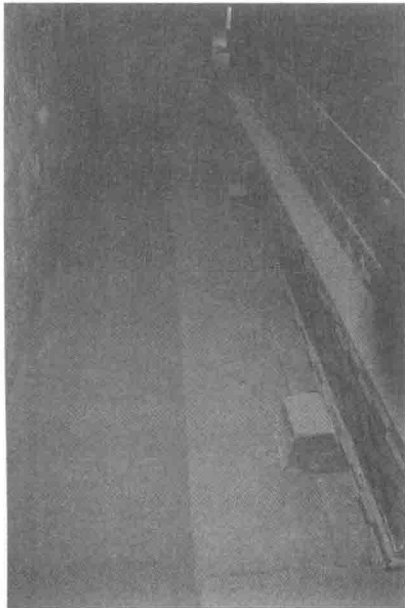
图七 4. 底纹图样



图七 5. 底纹图样



图七 6. 底纹图样



图八 1. 棺床石



图八 2. 棺床石题记